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冯洪荣：

中小学教研 各方热情需有序涌动

本报记者 贺春兰

中小学教研制度是中国教育体系的特色，更是我国的传统优势。2019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基础教育教研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进一步完善国家、省、市、县、校五级教研工作体系，教育部专门发文进行了具体部署。四年来我国教研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

9月23日全国政协以“中小学教研体系建设”为主题召开了双周协商座谈会对此予以关注。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郑富芝、张志勇等多位全国政协委员指出，调研发现，当前我国中小学教研体系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便是：教研机构弱化，独立设置的教研机构越来越少。据统计，目前全国只有7个省份独立设置了教研机构。

这次会议上，大学、社会等各方力量亦表达了进入中小学教研的热情。但在之后9月27日本报刊登的调研文章《谁能帮到我们》一文中，我们听到了一线教师的心声，一些对一线教师的支持性力量因为缺少协同，导致没有帮助而且添乱。

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对独立设置教研机构积极性不够？教研院在整个教研体系的各个环节如何发挥作用，才能有效而有序。

日前，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冯洪荣面对本刊记者的一番分析颇值得参考。

——编者

“中小学教研体系建设值得重视。此时，各方力量如此踊跃参与是好事。”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冯洪荣显然已经注意到了9月13日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大学、社会等各方力量进入中小学教研的热情。问题是，如何保障各方力量能够有序进入，彼此契合，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冯洪荣看来，较之于缺乏资源和力量而言，当前我国教研体系不够完善的核心问题是，链条上的各环节职能定位和彼此关系尚未完全厘清。

“教研体系建设是我国独有的，奠基于我国优秀教育文化传统，立足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对我国基础教育质量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值得重视。”冯洪荣对我国教研体系认识深刻，也参与了我国关于教研体系的重大政策的研制工作，说起我国教研体系中每一环的动力机制、新形势下的挑战和价值如数家珍。

冯洪荣自述自己便是在这种教研体系的支持下成长起来的。“一个人离开学校后到职场上的第一位老师常常对自己至关重要。”冯洪荣庆幸自己在工作第一站，在一所中学当老师时，遇到了一位难得的师父。30年前，正是这位师父一堂课一堂课的示范、手把手的指导，让冯洪荣成长为一位优秀的物理老师。而冯洪荣说的这种师父带徒弟的方式便是校本教研，把新老教师捆在一起上课。在冯洪荣看来，校本教研至今依然是我国五级教研体系的基石，在我国一线的教育教学中依然起着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

校本教研之上便是区级教研，在冯洪荣看来，我国区级教研定位清晰，权责分明，和校本教研之间常常能够互相补充。“区级教研有动力有机制有责任有权利，教研员的工作有进度有要求，有一套规范的体系。”鉴于我国区县基础教育第一责任人的事实，区县教研员常常要对所负责区域学科的基础教育担负着重要的责任，事实上承担命题制卷，质量监测的指挥作用。冯洪荣指出，这一级容易出现的问题是，研究不够，支持引领不够而为一线教师拼弃，但目前总体运转是规范的、有序的，责权统一的。

冯洪荣指出，当前问题比较多的是省市级教研的转型和定位问题。在冯洪荣看来，不论身处教研体系中的哪个位置，中小学教研这项工作的本质决定了体系中所有环节的教研都要对教师的教育教学有帮助有益。这也恰是高校的学术研究对中小学教研的本质不同。如果说高校更多基于学术研究，提高教师学术素养。中小学教研则要直接服务于学科教学，要有更强的操作性。这中间，从大学的学术研究走到服务于中小学一线的教育教学，其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不能完成中间环节的转换，变理念为可操作的方法，高校参与中小学教研的作用将很难充分发挥，便很难对中小学老师产生价值。

而对比区级和市级两级教研队伍，相对而言，区级教研员更偏操作，经验优势更强。而市级教研员，不仅要有经验基础，还要求具有更高的学术修养，从而能够涵养滋养到区教研员和广大中小学教师，从而最终全面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也正是基于此，北京教科院一直在探索自己的价值和定位。据冯洪荣介绍，精准定位，在一定意义上关乎一个省市级教科院的生死存亡。

据冯洪荣介绍，包括省市级教科院在内的我国事业单位的运转一度带着很强的行政色彩，同样是一级管一级，所以，省市级教科院不存在自己找位置找发展动力的需要——基于行政动力对上负责，也基于行政动力对区县教科院提出要求，伴随着“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一事业单位的改革取向，自10多年前始，省市级教科院已经不再对区县级教科院有行政职能，而是业务统筹指导。如果省市级教科院不能及时转型，从行政要求变成有效的专业引领，自然就面临发展风险。

事实上，今天，在中央政策强调包括国家、省、市、区县、学校五级教研体系建设完善的背景下，依然有一些省市级教科院遭遇了被地方政府合并甚至放弃的事实。尽管有种种原因，但在冯洪荣看来，新形势下的定位不清所导致的价值

丧失当是根本原因。“正是因为定位不清，一些教研机构没有能有效发挥引领作用，面临着被裁撤的风险。”

而今天的北京教科院，在300余位工作人员构成的团队中，有70多位研究人员组成的中小学教研中心。北京教科院对这支队伍的要求是，上接天下、接地气，要把中央精神，把前沿的教育理念变成可以检验需要检验的实验或者可以操作可以推广的模式。在冯洪荣看来，“只有这样，方能到区里到中小学去。要么是去学校找实验田，要么是去学校推广。总之，要有理念还要有可操作的一套方案。”而在北京教科院，在中小学教研中心之外，还有学前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所、德育研究中心等多种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一方面对上级行政部门提供政策咨询，另一方面，又能随时和中小学教研中心互相补充呼应交叉融合。从而对中小学教研队伍的多元视野起到全面的滋养作用。”

冯洪荣认为，鉴于我国教研体系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服务于一线教师课堂教学教学质量的提高，“越往上越要融，越往下越要专。”

结束与冯洪荣院长的对话，记者脑海中萦绕着这样一句话：建设一套有序有效有用的完善的中小学教研体系，需要各环节力量的强化，还需要各环节的清晰定位和基于清晰定位之上的各环节的彼此支持契合。

能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的人才还很稀缺

本报记者 朱英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高等教育要为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心提供人才支撑，以助力我国现代化强国建设。”在不久前全球化智库(CCG)等单位主办的2023国际人才培养与发展论坛现场，国际胜任力培养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原副秘书长张宁开门见山地指出当前我国在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45年来，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有700多万人，90%以上各类人才完成留学期限的人都回国工作了。如此，便呈现出一种我国当下并不缺少国际化人才的假象，但是事实上，现阶段我国国际化人才仍然十分稀缺。”在张宁看来，人才的缺乏主要表现在以下六方面：国际组织人才；能够和“一带一路”国家进行交流合作的人才；能够与全球进行交流合作、参与全球治理工作的人才；在外国跨国公司中能够担任高级管理的人才；“双一流”建设人才；国际传媒人才。

“第一，缺乏国际组织人才。”在张宁看来，我国在国际组织中任职人员的代表性方面仍然十分单一。“第二，缺乏能够和‘一带一路’国家进行交流合作的人才，即严重缺乏能够促进、参与南南合作的人才。”张宁表示，能参与南南合作的人才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中格外需要。“当下，很多人会和发达国家打交道，但却不会和发展中国家合作。而全球有197个国家，发展中国家有160多个。很多人项目没做好，事情没办好，总是在埋怨别人不按国际规则办事、效率低下，其实根本上是对对方的文化缺少深入了解和理解。”

“第三，能够与全球进行交流合作、参与全球治理工作的人才也极为稀缺。第四，在外国跨国公司中缺乏能够担任高级管理工作的中国籍特别是大陆培养的人才也很稀缺。”张宁表示，平常看到中国籍外企高级管理人员，主要都是负责中国区业务或者东亚区业务的。很少能够见到有分管非洲事务、拉美事务、北美事务、欧洲事务、中东事务的中国籍高管。对此，张宁认为，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逐渐提升，亟须高质量的国际人才能够加入到跨国企业管理层中去。

“第五，缺乏‘双一流’建设人才。”“双一流”建设旨在追求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没有国际胜任力的人很难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一流大学。围绕此方面的人才欠缺，张宁表示，“国家希望能够‘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这需要凝聚优秀的国人，也还要吸引世界上优秀的人才来中国。如果没有跨文化的交流合作能力，不尊重多样性，世界一流学科、世界一流大学很难建立。”最后，张宁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在文化传播上的行动指向。”但在他看来，我们仍然缺乏国际传媒人才。“当下，即使有些人外语很强，但是别人很难理解他们表达的内涵。这些人还不能开展跨文化的有效交流，以他人熟悉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在这些领域，未来我们会需要上百万的优秀人才，这是当前高等教育培养中的弱项，亟须加强。”张宁呼吁。

新闻背景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之际，10月17日至18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该次论坛主题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本届论坛不仅是纪念“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最隆重的活动，也是各方共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平台。

本届高峰论坛充分展示了“一带一路”中国倡议、全球响应、世界共赢的鲜明特点，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进展，对外传递世界各国团结、合作、共赢的积极信号，为世界提供正能量、注入稳定性。

正如多位全国政协委员指出的：中国的现代化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世界现代化应该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互利合作的现代化、共同繁荣的现代化。

而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建设一个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背后的关键则是人才建设。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留学生 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



10月18日，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医医院依托国际学生中医药文化体验基地，与山东科技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联合，邀请俄罗斯、摩洛哥、斯洛伐克、萨尔瓦多、伊朗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留学生，体验针灸、拔罐、推拿、艾灸、耳穴压丸等中医传统疗法，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

上图：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医医院，山东科技大学国际交流学院斯洛伐克籍留学生梦娜在体验中医传统疗法耳穴压丸。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医医院，来自山东科技大学国际交流学院的留学生在了解中医香囊的功效。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医医院，来自山东科技大学国际交流学院的留学生在习练八段锦。

加强新时代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

秦和

教育具有跨文化属性，不同的国家、民族尽管在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普遍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将教育作为国家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支柱，在教育改革发展方面有许多做法和经验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为此，有可能也很有可能开展教育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回顾二战以来的历史进程，无论国际局势如何风云变幻，教育始终都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领域，在促进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相互理解、相互融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如火如荼开展起来。实践证明，这是推动我国教育改革不断深入、促进我国教育质量不断提升的重要渠道，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力服务和支撑了我国对外战略的实施。

当前，我国面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国际形势越是严峻，对外开放的大门越是不能关闭。教育作为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相互学习、相互了解、相互促进的重要领域，在国家对外工作中肩负着特殊而重要的使命。教育自身的特点也决定了办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学习借鉴世界先进教育理念和成功实践。这些都迫切要求提高站位，在

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采取更加积极、主动、有效的策略，着力构建新的教育对外开放格局。为此建议：

从战略上摆位和部署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是简单的业务性工作，而是关乎国家对外工作布局、关乎教育事业发展全局的大事。这件事情办好了，可以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议从国家层面对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作出新的顶层设计，在国家外交工作全局的视野下谋划和部署新时代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适时调整教育交流与合作的策略。比如，从交流与合作的层次和类型看，建议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纳入重点领域。从主体看，建议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心下移，鼓励地方特别是市、县、学校层面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与合作。更加注重发挥民办学校的作用，鼓励和支持民办学校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大力支持发展民间教育外交。

以国际交流与合作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本身是载体，根本目的是要通过交流与合作这个纽带，服务和推动教育事业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要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这是一条贯穿今后一个时期教育工作方方面面的主题主线，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也要聚焦这一主题主线。比如，

支持有关高校和研究机构，通过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牵头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面向国际招揽高层次人才。尤其要针对我国教育存在的短板，加强与有关地区的交流与合作，结合实际学习借鉴、取长补短，加快我国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进程。

着力为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营造良好环境。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当前开展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还面临诸多困难。建议有关部门牵头，立足新时代新要求，对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相关政策进行梳理，该调整的调整，该完善的完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要有非常之举。同时，要大力宣传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成效和典型，加强正面宣传，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面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教育故事。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有令全世界瞩目的教育改革成效，探索了中国特色的教育发展道路。加强教育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要格外注重对我国教育优秀传统的挖掘，注重对教育事业发展成就和经验的总结提炼，采取适当方式，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教育故事，让世界对中国教育有更为全面、准确、深入的了解，树立中国教育的良好形象，不断扩大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外国语大学校长)